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史

The History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黄宏 张彬 主编

本书是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写这一进程进行梳理，具有学术的前瞻性和权威性。全书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研究”的基础上，该项目自2007年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立项，由黄宏、张彬担任首席专家，项目组成员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目前对修改意见所做的修改已告一段落。

凤凰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图书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史

The History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黄宏 张彬 主编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 / 黄宏, 张彬主编.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7-5506-1041-5

I. ①马… II. ①黄… ②张… III. ①马克思主义—
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51708 号

书 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
主 编	黄 宏 张 彬
策 划	宋增民
责任编辑	吴 源 杨建平
责任校对	李洪云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公司网址	北京凤凰天下网 http://www.bookfh.cn
印 刷	北京泽宇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市怀柔区庙城镇王史山村, 邮编: 101401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6.5
字 数	623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1041-5
定 价	48.00 元

(本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发行部调换, 联系电话: 010-58572106)

黄 宏

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而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研究,是一个最具理论性、实践性、现实性,也是最具有指导性、前沿性和挑战性的研究课题。深入研究和科学总结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科学地、历史地、逻辑地展现和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系列重要成果及其科学体系形成发展的过程,充分展现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理论品格,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和内在规律,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把握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战略思想的历史地位及创新意义,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并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开拓前进,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们感到有这样一些需要很好把握的问题。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必须始终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尊重历史,客观地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论从史出,只有将历史发展的脉络、线索、标志性事件和阶段性特点交待清楚,才可能得出确切的结论和理论概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中国共产党的党史是一致的,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党的历史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30年,那么它与党的十七大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及其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是什么样的关系?对第一次飞跃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对第二次飞跃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学术界、理论界并无分歧。问题是对建国后29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怎么看。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作的探索应该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如果这样,将无法说明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质的规定性;而完全不提及,则也无法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由来和历史逻辑。因此,我们认为党的十七大所作的两个历史性飞跃的概括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也需要对建国后29年我们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所作的探索,予以科学的说明。于是,我们依据我们党关于党的历史若干问题决议,对建国后29年的探索,分设三章,即“中国特色革命转变理论的提出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

步探索与失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暂时中断”，使其与两个伟大的历史性飞跃有机地衔接起来，揭示了这29年与两个飞跃内在的逻辑联系。它们既是前一个飞跃的延续，又是后一个飞跃的准备。从某种意义上说，探索的失误，也为后来的成功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宝贵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讲，总结失误的教训，与探索成功的经验，同样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具体的，它必须通过民族化的形式来实现，显现出强烈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须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来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从形式上讲，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央领导都善于用民族化的形式来诠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把来源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经过革命的改造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用有强烈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思想文字和语言表达出来。这看上去是个形式问题，而本质上讲，则是形式和内容相统一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也就是说，是教条式地宣传、运用马克思主义，还是使之内化于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用一个“实事求是”便把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精髓表达出来。言简而意赅，既使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有了中国式、民族化的生动表述，又使中国传统文化的成语典故被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内容。同样的，如果说《论语》中的“小康”还只是一种抽象的、空想的概念，而经过邓小平、江泽民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阐述，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诠释，便赋予了它崭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时代内容，成为了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实实在在的奋斗目标。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已经内在地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成为其有机的一部分，而不只是一个外在的形式。因此，民族化，决不是某些人所说的“被儒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决非是“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改造，被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当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式和内容，都统一于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按照中国的特点应用它”。^①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一个不断地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并从中产生新的理论飞跃的历史过程，必须突出其实践性的品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不同于一般的党史，也有别于一般的思想史。它的侧重点在于以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为重要目的，全面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充分展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重要成果和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理论品格，从而进一步推动我们党的理论创新，为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一步武装全党服务。正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具体的，因此它总是与一定的历史条件相结合，一切以时间、条件为转移。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党需要面对和回答不同的时代挑战，而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性要求。实践是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可宝贵的品格。本书的撰写，我们力求突出这一品格，说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第658、659页。

明毛泽东思想的产生是基于20世纪初期的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动力以及革命道路的实践性要求而产生的,是源于实践的产物,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总结其丰富经验、教训而获得的规律性认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理论形态,也都是在时代条件发生变化,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实践中,我们党总结其丰富经验,并充分借鉴、吸取了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及世界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并反过来在指导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一步步深化而形成的。实践,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高要求和必然结果。它是思想史,更是实践史,思想与实践始终是相伴而行的。

第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一个哲学命题,必须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总结其历史经验,注重总结反映对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一个纯思辨的哲学命题,但它充满了哲学意蕴。不上升到哲学的层面和高度,就不可能认识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是在什么地方失足的。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都是从认识论上的分歧和争论发端的,我们党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四个理论成果的认识论本质,可以说都是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实现了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结果。本书在阐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两大历史性飞跃的逻辑起点时,都是从对当时历史条件和国情的分析,上升到思想路线的高度来展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解读”这一章用“系统阐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条件”、“《实践论》的主要思想及其理论贡献”、“《矛盾论》的主要思想及其理论贡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军事领域的具体运用”四节的篇幅,为后面“中国特色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中国特色革命转变理论的提出和实践”两章,作了哲学,特别是认识论上的阐述和铺垫。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的论述,也是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来打头的。其后才有“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和“全面改革开放及其理论的系统化”。这就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从中我们看出,实事求是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毛泽东把“实事求是”几个大字赠给了中央党校,把它确定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的整体性分析,注重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研究和总结。认真学习在理论创新过程中,我们党是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分析近代中国和各种社会矛盾,并创造性地解决这些矛盾,走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独特道路来的。

第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项从未有过的崭新事业,没有任何现成的结论和模式可供参考和借鉴,这就使它同任何科学的事业一样,具有探索性的特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着力反映我们党勇于进取、勇于创新理论勇气。探索性首先是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性决定的,真正的科学,不承认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承认有什么终极的真理,必须尊重客观规律,敢于修正已有的认识,不断解放思想,打破认识的禁区。在探索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道路的时候,毛泽东提出的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等等主张,提出的新民主

主义论,都曾经被看成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异端邪说。改革开放30年,我们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也经历了一个误区,即开始完全囿于苏联建设的历史经验,错误地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经济特征。在改革实践的推动下,我们才一步步地走出来。从最初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经党的十二大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开始承认市场调节的作用,到十三大明确“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变了过去“以计划经济为主”的提法,再到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终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步步建立起来,并随着实践的发展,一步步趋于完善。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曾提出“摸着石头过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这样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创新,在打破一个个认识禁区的过程中开拓前进的。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对一个科学体系的建立,都是十分宝贵的。自然科学自不必说,哪一个科学原理的发现,不经上百次的试验和失败;社会科学也应该有一种不怕挫折的试错机制和承认认识相对性的科学态度。即使是对毛泽东所犯的“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错误,邓小平也看作是宝贵的财富。我国在改革开放初建立的几个经济特区,就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勇于探索、开拓进取的勇气。我们希望把中国共产党人勇于开拓、创新的探索精神和过程反映出来,这也是本书主观上希望作出的努力。

第六,马克思主义是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一个广采博取、充分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吸收和借鉴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的过程,它拒绝把自己变成一个封闭的、排它的体系。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许多有益成分,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自强不息、爱国忧民、以人为本、崇尚真理、追求自由、推崇和谐等等精神,很自然地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吸收和改造,成为了新的时代精神。这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被儒化,而恰好是在批判和传承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成分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吸收。在西方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交融、贯通、有机结合中,在中国的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放性、包容性,还表现在它对当今世界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中积极因素的吸收和借鉴。在历史观上,我们当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罗马俱乐部、绿党以及生态社会主义等等有根本世界上的不同,但他们对人类共同面临问题的关切和主张,对一些反映人类社会和社会生产发展等规律的思想观点,同样可以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和借鉴。这样一些价值应该属于全人类。我们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论就充分吸取、借鉴了人类文明的积极成果,借鉴了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理念和经验教训,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有更多的国际视野和当代意蕴。这种开放性、包容性,恰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表现的自信和生命力。

第七,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战斗的马克思主义,它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批判性。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公开宣布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邓小平也把我们正在进

行的改革开放,称之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不仅过去夺取政权,是一场革命,今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建立和改革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发展生产力,用邓小平的话来说,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决不是学者书斋里那种纯学术领域中的某个学派,而是要发现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以此用这一理论武装群众,改造世界,改造社会。作为无产阶级的学说,它并不掩饰自己的政治立场,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它当然要拿起批判的武器。我们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都公开昭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鲜明的阶级立场。我们不仅对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坚持批判的立场,对现存社会主义社会中,种种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人民群众利益的消极腐败现象,也都持毫不留情的批判态度。革命性和批判性是辩证法的本质,同时也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我们不会放下手中批判的武器,对种种企图改变我国的改革开放道路,背离社会主义方向的“左”的和右的思潮,形形色色的新自由主义,种种“告别革命”名义下的所谓“去革命化”思潮,我们都不会放下批判的武器。

第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集中全党智慧的过程。党的理论创新,不仅仅是领袖人物的创造和贡献,它也包含着对全党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全党理论工作者所作的创造性努力。理论创新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还在我们党的初创阶段,一批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恽代英、邓中夏、李汉俊、蔡和森、瞿秋白等都为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他们已经意识到“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①。而恽代英所说“我们的任务,在寻求一个适合国情,而又合于共产主义的方针来”^②,则已蕴含着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了。众所周知,毛泽东在撰写《实践论》、《矛盾论》这两部可以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系统表达的伟大著作时,就曾经吸收和借鉴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一些有影响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这在毛泽东《哲学批注》以及给艾思奇的信中都有充分的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理论工作者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于生产力、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几次大讨论,都为中央领导集体的决策,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党的十四大之前,江泽民同志就多次主持召开了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座谈会,广泛听取理论界的意见和建议。所以我们党的理论创新的每一个重大成果,都凝聚了全党理论工作者的心血,同时更是对全党实践新鲜经验的科学总结,它是全党智慧的结晶。理论创新,领袖人物的重要作用无疑是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有些作用是决定性,是由他们来集大成,加以抽象、概括而形成理论的,所以这个成果,我们有的就以领袖的名义来命名,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但是理

① 《李大钊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第3页。

② 《恽代英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5月1版,第258页。

论创新决不是一个人、几个人,而是一个党。全党的理论工作者和广大群众,都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和努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理所当然地是中国共产党及广大理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与我们党休戚与共的民主、爱国人士,及其他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社会阶层,也都在不同层面和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第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个根本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就是它的群众性,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毛泽东始终强调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强调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实行群众路线,并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唯物史观教育全党。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一再强调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永远不能变,而最最重要的,就是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三个有利于”、人民利益至上的思想是整个邓小平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有些人把邓小平理论简单地归结为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不讲邓小平是什么意义上讲这个话的,这是对邓小平理论的歪曲。因为邓小平同时强调了改革开放不能出现“两级分化”,如果出现,那我们的改革开放就“失败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是改革的最终目的,如果那样,我们还有什么资格代表人民群众,还有什么资格称我们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见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是一个手段、策略和路径问题,当然也是一个在一定时间,一定条件下,必须坚持的重要政策,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和归宿,只能是使全体中国人民走上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江泽民和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都把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一切奋斗的出发点和最高衡量标准。这也就成为了一块试金石,划清了我们和一切以“改革”和“创新”理论为名,为某些“既得利益”集团服务的伪马克思主义的界限。

第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其时代性,必须面对世界正在发生的剧烈变革,回答各种挑战。21世纪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世纪,是社会生活发生剧烈变化的世纪,也是国际战略格局和大国关系产生深刻变动的世纪,今天的资本主义与18、19世纪,甚至20世纪的资本主义相比都发生了许多变化,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人类居住环境的变化,使全世界都必须面对人类共同遭遇的挑战。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将要承担起复杂的国际责任,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将会碰到更多的挑战,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具青春和活力,理论就必须紧随时代,所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突出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这一最可宝贵的创新品格。我们应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性,更加注重回答我国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问题,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有前瞻性,科学地预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可能面临的新挑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性、创新性、前瞻性都统一其科学性。在它的入口处,我们将需要杜绝一切的犹豫、彷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门真正的科学,是实践的科学,是战斗的科学,是永远遵循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在大胆实践不断深化认识,开辟从必然到自由道路的科学,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目 录

前言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1
-----------------------	---

第一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1919—1956)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1917—1921)	3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其作用	3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简要历程	8
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要思想观点	12
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经历的思想斗争	18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和革命道路的初步认识(1921—1937)	24
一、揭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制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24
二、在大革命实践中探索革命具体问题,提出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领导权等基本思想	27
三、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31
四、提出党的建设、人民军队建设和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理论	37
五、反对本本主义,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39
第三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解读(1937—1940)	42
一、系统阐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条件	42
二、《实践论》的主要思想及其理论贡献	47
三、《矛盾论》的主要思想及其理论贡献	52
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军事领域的具体运用	58
第四章 中国特色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发展(1940—1949)	64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	64
二、确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70
三、中国特色革命理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后期的丰富和发展	77

第五章 中国特色革命转变理论的提出和实践(1949—1956)	84
一、中国特色革命转变理论的提出和演进	84
二、中国特色革命转变的理论与实践	90
三、中国特色革命转变的评析	98

第二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发展(1956—1976)

第六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步探索与失误(1956—1966)	105
一、探索的曲折过程	105
二、探索的理论成果	111
三、探索的重大意义和历史局限	119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暂时中断(1966—1976)	123
一、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陷入误区	123
二、“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	128
三、“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支撑及其错误	133
四、十年浩劫的严重危害及历史教训	138

第三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1976—

第八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恢复与新时期的开辟(1976—1982)	147
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147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新时期的开辟	150
三、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158
四、十二大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学命题的提出	163
第九章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轮廓的初步形成(1982—1987)	166
一、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	166
二、全面改革开放及其理论的系统化	171
三、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的契合	177
四、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180

第十章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新国情论(1987—1992)	186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	186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本内容	194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196
四、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202
第十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初步形成(1992—)	206
一、南方谈话的背景及经过	206
二、南方谈话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新观点及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	208
三、党的十四大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初步形成	217
第十二章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向实践的全面转化(1992—1997)	223
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23
二、实施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228
三、推行经济社会发展新战略	237
第十三章 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新探索(1992—1997)	245
一、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定位和阐发	245
二、在实践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	250
三、深入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规律	259
第十四章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化(1997—2000)	267
一、牢固确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267
二、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纲领化的立论基础	272
三、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275
四、坚持党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辩证统一	279
第十五章 “三个代表”的提出和系统阐述(2000—2001)	285
一、“三个代表”的提出及其出发点和着眼点	285
二、“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290
三、“七一”讲话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系统阐述	293

第十六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世纪的新开拓(2001—2002)	300
一、党的十六大召开前的思想理论准备	300
二、党在新世纪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306
三、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系统而深刻的阐发	311
第十七章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2003—)	317
一、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发展	317
二、科学发展观是内涵丰富的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内政外交的思想指南	323
三、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	332
第十八章 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新成果(2004—)	336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理论的与时俱进	336
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思想的系统阐发	343
三、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思想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中国化	351
第十九章 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建设理论的新发展(2004—2006)	358
一、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是新世纪新阶段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成功实践	358
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对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启示	365
三、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重大战略思想的重大创新	368
第二十章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的新认识(2005—)	373
一、人类关于社会和谐的思想与当代中国实践的契合	373
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	379
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386
第二十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初步确立(2007—)	390
一、十七大的历史地位和理论贡献	390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	396
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要求	402
主要参考文献	408
后记	411

第一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

(1919—1956)





(1917—1921)

20世纪20年代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广泛传播并成为社会主流思潮,并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条件。辛亥革命、初期新文化运动、俄国十月革命、五四运动等,从不同方面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19世纪末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零星介绍阶段;二是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开始传播阶段;三是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阶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思想观点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唯物史观是历史观的根本变革,生产力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最高动因,阶级斗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经历了同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三次大论战。通过论战,马克思主义获得了更大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其作用

20世纪20年代前后,在诸多传入中国的西方社会理论与思潮中,马克思主义能够脱颖而出,首先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产生重要影响,继而与社会运动相结合,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这决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条件。从社会运动的角度来看,这些社会历史条件与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俄国十月革命、五四运动等紧密相连。它们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提供了客观基础,而且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思想内容和发展进程。

(一) 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及其重大启示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与近代无数仁人志士对救国救民真理的艰辛求索紧密联系在一起,是近代中国革命不断选择科学指导思想的必然结果。众所周知,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时,帝国主义列强横行霸道,操纵着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封建统治者丧权辱国,勾结帝国主义残酷压榨中国人民。国家日益贫弱,社会战乱不已,民族灾难深

重,人民饥寒交迫。”^①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为了完成这两大任务,中国人民进行过无数次艰苦卓绝的斗争,但都失败了。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求索,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思想智慧,或借鉴学习西方自然科学成果和社会思想学说,但都没有找到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科学真理。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发生的一系列革命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意义。它高举民主共和的旗帜,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端。从那时候起,中国人民才自觉地为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而进行斗争。毛泽东曾把孙中山称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并认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②。辛亥革命“起共和而终帝制”,就此而言,它成功了;但政权重新落入封建军阀手中,共和国名存实亡,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没有改变,极端贫穷落后的状态没有改变,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辛亥革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失败了。

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理论指导和方案设计不符合中国国情是一个重要原因。事实表明: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下,以资产阶级思想理论为指导,走资本主义道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革命取得成功。辛亥革命的失败,给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以深刻启发,认识到必须要寻求新的思想、探索新的道路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这实际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以及中国革命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许多都深受辛亥革命的影响,并通过思考和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而接受马克思主义,实现了自己的思想转变。林伯渠在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时说:“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地从痛苦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③正因如此,毛泽东强调指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④

(二) 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

人们通常把新文化运动分为两个阶段:1915年9月至1919年5月,属旧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1919年5月至1923年,属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⑤初期新文化运动指的是新文化运动的第一阶段。

①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627—162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563页。

③ 林伯渠:《荏苒三十年》,《解放日报》1941年10月10日。

④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30日),转引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6页。

⑤ 参见《中国现代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第2页。